

# 新文化運動與衛生啟蒙

張大慶

**[提要]** 本文從思想史的視角追溯新文化運動中健康與政治的互喻、新衛生觀念的傳播，探討新衛生觀念的啟蒙；從中西、新舊、科玄之爭，探討醫學如何成為文化批評的公共話題；從衛生運動、大眾傳播、日常生活等方面，探討國家治理與社會改良。新文化運動深刻地改變了國人的生觀、價值觀和科學觀，也深刻地改變了國人的健康觀和疾病觀，並由此影響著近代社會和科學的演化方向。在新文化運動與科學啟蒙的話語中充滿現代醫學的隱喻，其寓意在於通過身體感受的共情來激發普通民眾對新觀念的認同，從而有助於認識與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 新文化運動 衛生啟蒙 社會改良

**[中圖分類號]** R-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3 - 0181 - 11

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sup>①</sup>

精神懦弱者不可以謀國，魄力委靡者不可以圖強。遍察環球列邦，民族不振，其國未有能強。今使醫學不先講求衛生，更誰促進？徒以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各問題為鼓吹，期望民族之強盛，是不啻徒沃枝葉而不培根本矣。<sup>②</sup>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過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sup>③</sup>

夫我國醫業不振，退落列強之下，歷年民生死於非命，時罹痛苦者，恒沙難數，深堪惋惜。溯自世界三十載以來，新醫蒸蒸日上，新學時有發明。獨惜我文物之邦，猶未沾此利益，實具特別原因。人之眼光，注射於前。如大學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而我之眼光，留戀於後，徒讀父書，墨守成見，背道相馳，優劣自判天壤。<sup>④</sup>

上述論述分別摘自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雜誌》和1915年10月出版的《中華醫學雜誌》。若不標引作者，幾乎可視為一篇文章。一百年前，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採用

現代醫學的比喻來論述社會發展之規律。同年，伍連德（被梁啟超譽為當時唯一一位“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與顏福慶等創建中華醫學會，並在《中華醫學雜誌》創刊號上發文論述醫學發展與國家興衰之關係。這種現象並非巧合，而是現代醫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動員社會、啟蒙大眾作用的彰顯。從思想史的視角追溯新文化運動中的衛生啟蒙，探討醫學如何成為文化批評的公共話題以及衛生如何作為國家治理與社會改良的策略。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深刻地改變了國人的生觀、科學觀、健康觀和疾病觀。在新文化運動與科學啟蒙的話語中充滿現代醫學的隱喻，其寓意在於通過身體感受的共情來激發普通民眾對新觀念的認同，從而有助於認識與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與價值。

## 一、新衛生觀的啟蒙

### （一）健康與政治的互喻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敘述中，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歐美及日本列強為參照，“國弱體虛”、“落後挨打”成為社會進化觀念的邏輯表達式。伍連德認為改變這種情境亟需謀醫學之改革：“優勝劣敗，天演昭然。現時吾全國心目中所最激刺者非日本乎，當五十年前，維新伊始，非以改革醫學為入手，何有今日吾國不欲圖強則已。苟欲圖強，萬不能不謀改革醫學，使再永永淆亂，無有窮期。”<sup>⑤</sup>清末民初，“健康”、“疾病”、“衛生”的概念並非僅僅是一個醫學的概念，它們與國家、社會、個人的精神與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倡導衛生、增進健康不只是個人身體與精神的提升，更是民族國家強盛的標誌，所謂“強國強種”已成為一種有識之士的政治訴求。身體與國家，醫學與政治，有著深層的相關性。十九世紀中期，醫學社會化的思想隨著歐洲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發展受到了普遍的重視。法國醫生蓋林（Jules René Guérin）呼籲為了公眾的利益應建立新的社會醫學體系，即一個由醫學監督、公共衛生、法醫學等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他把社會醫學分為四個部分：（1）社會生理學研究人群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及其與法律、社會組織制度、風俗、習慣等的關係；（2）社會病理學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會問題；（3）社會衛生學研究增進健康、預防疾病的措施；（4）社會治療學制定治療措施和其他手段來對付社會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和其他情況。德國醫學家諾伊曼（Salomon Neumann）以及精神病學家洛伊布舍爾（Rudolf Leubuscher）則強調社會經濟因素對健康和疾病的重要作用。1847年，諾伊曼提出“醫學科學的核心是社會科學”<sup>⑥</sup>。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健康是社會直接所關切並負有義務的事情，而社會環境和經濟狀況對健康和疾病起著十分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決定性的影響。1848年，醫學家微爾嘯（Rudolf Virchow）也提出“醫學就是政治，政治不過是更大的醫學”的觀點。這類關於醫學與社會、健康與國家的觀念促成了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將公共衛生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例如，法國各地都設立了衛生議會（Conseil de Salubrité）、英國組建了國家衛生局（National Board of Health），而德國建立的是醫務警察體系（Medicinischen Polizey）。福柯（Michel Foucault）把這種“由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人種等這些在人口中構成的活人總體之特有現象治理實踐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合理化”稱為“生命政治”，他認為生命政治自十九世紀起便成為政治和經濟的關鍵之處。“民族衛生”的觀念不僅影響到歐洲各國，而且對正處於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期的中國產生了更大的衝擊。

清末民初，已有關於歐洲醫療保健制度與公共衛生運動的介紹。1897年，劉楨麟在《知新報》撰文指出：“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

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然治已病不如治未病，為他人醫不如人人自醫。傅蘭雅所謂以免病代治病，斯為上工，若是者，捨衛生末由也。”<sup>①</sup>1903年《萬國公報》載文“論近百年來醫學之進步”，除介紹了細胞病理學、細菌學、麻醉劑等醫學技術的進步之外，也介紹了公共衛生制度的發展，如生命與死亡統計、城市衛生等。1914年，《大同報》登載“英國公眾衛生制度詳記”，介紹了“現行之公眾衛生法律，衛生官之職務，衛生調查員之事務，政府對於人民之責任，衛生團體設立”等，這些介紹凸顯了現代醫學或公共衛生的社會與政治價值。

新文化運動中，醫學與政治的互喻已成為人們通常採用的話語模式。如陳獨秀在論述愛國主義時，強調“不在為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為國家惜名譽、為國家彌亂源、為國家增實力”。他指出，為國捐軀之烈士雖為人服膺、崇拜，但只是治標而非治本，因此提出“持續而治本的愛國主義”：勤、廉、潔、誠、信。陳氏把“潔”提升到有關國族形象的政治層面：“華人足跡所至，無不備受侮辱者，非盡關國勢之衰微，其不潔之習慣，與夫污穢可憎之辮髮與衣冠，吾人訴之良心而言，亦實足招尤取侮。”他還更進一步指出國人“沉迷於利祿而不自覺”、“婢膝奴顏，以為至樂”的“內心之不潔，尤令人言之恐怖”，由此提出“愛國志士宜使身心俱潔”<sup>②</sup>。無論是在論述愛國主義或是強國方略時，強種健民始終是當時最為優先的考量。正如史介生所言“強國的要則，先須強國民的身體，欲強國民的身體，先須知衛生的方法。……由此觀之，則醫藥學和衛生法，於國民有密切的關係，於國勢有強弱的影響。”<sup>③</sup>

## （二）疾病作為政治修辭

在人類歷史上，疾病作為政治的一種修辭頗為常見，人們往往將疾病尤其是瘟疫視為異族或異邦帶來的邪惡之物，也常被視為個人品行或族群特徵的標識。如歷史上關於梅毒、麻風、脊髓灰質炎等傳染病，常與邪惡、異族入侵者的想像聯繫在一起，或者是對社會墮落、個人不良行為的懲罰。儘管疾病的政治修辭或者隱喻有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傾向，容易忽略對於政治事件或文化問題的深層探究，但改革者或革命者往往通過這種感同身受的隱喻來喚起人們變革的激情。在中國近代的“救亡圖存”語境裡，疾病和體弱作為一種文化隱喻，很自然地成為政治家、知識菁英、地方士紳甚至普通民眾的國家或民族形象的想像，由此形成了一套“強國強種”的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可讓所有人清楚地感受著國家像病體一樣被侮辱、踐踏和歧視，進而又把被治療的病體想像成民族再生的符號。

身體健康、習慣衛生被視為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之分的標識。“民族體質之優劣，與繁殖之消長，係國家之盛衰，或竟至於亡國，實屬天演公例，無待贅言。吾人應如何使吾民族優良向上，免東亞病夫之號。”<sup>④</sup>“東亞病夫”為清末民初最為熟知的以疾病隱喻社會政治的概念，其並非單純指國民體質的虛弱多病，更強調的是國體的積貧積弱、國民的麻木不仁。有人把“東亞病夫國之病”概括為四大病象：其一為癱瘓：地方各自為政，中央號令不靈，恍如四肢癱瘓之人體，手足麻痺，難以動彈；其次為貧血：國家財政空虛，軍閥誅求無厭，當局補血無術；再次為瘡疾：社會動盪時常發生，類似三陰瘡疾，愈發愈凶；第四為秋瘟：干戈擾攘，不啻瘟神下降。瘟勢大強，歷次百姓罹此而死者，難以盡數。根治這種疾病，則有待醫國高手，苟能對症發藥，俾得立起沉疴。<sup>⑤</sup>

疾病的修辭不僅體現為軀體病痛的隱喻，在精神與心理上的隱喻更為豐富。陳獨秀在論及新舊青年之區別時指出：“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他認為，中國青年體弱又不識衛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增加。他引用了1912

年德、美、英、日青年之死亡病因的統計數據，指出這些國家因重視教育、體育、衛生，十餘年來青年健康狀況改善顯著，健壯活潑，反觀我國“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鳳毛麟角”，並提出“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首應於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資格”。<sup>⑩</sup>因此，軀體與精神的健康既是醫學問題，也是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身體之強弱繫焉，一生之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的健康觀念也是一種社會的政治哲學觀念。

### （三）衛生知識的傳播：普及還是規訓？

新文化運動前後，湧現出一大批醫藥衛生類的期刊，這類期刊大多以引介現代醫療衛生知識為主要內容，旨在促進現代健康觀、衛生觀、醫療觀的普及與傳播。據宋大仁、沈警凡統計，自光緒八年（1882）至1935年53年間出版的醫藥類期刊共315種，其中清末出版的20種，新文化運動前後（1912～1924）出版的74種，1925～1935年期間出版的221種，其中80%以上為醫藥衛生科普類期刊。雖然，許多期刊都是曇花一現，出版一二期便停刊<sup>⑪</sup>，但是種類繁多的醫藥衛生期刊，對於普及醫學知識、傳播衛生觀念還是頗有成效的。醫學期刊的創辦者主要有醫學專業學術團體、衛生行政與研究機構以及大眾媒體。1915年創刊的《中華醫學雜誌》（*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是新成立的中華醫學會主辦的學術期刊，但在創刊初期，雜誌也將醫學知識的科普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中華醫學雜誌》首任總編輯伍連德在論述該雜誌的特色時，特別強調“本雜誌則惟就通常淺文字，務使稍具普通學識者即可一目了然。”<sup>⑫</sup>在該雜誌的創刊號上，伍連德撰寫了“衛生餐法”一文。伍氏介紹了自己創制的衛生餐台：“以一具方圓均可狀如大盤，或木製銅製，以能容四五盤碗為度，下裝一座，愈低愈合，可以旋轉。每人各備一套食具，各件盤菜另置一匙，隨意拉轉，將各匙引入座前個人食具而吃。見者頗稱利便，絕無傳染之虞，並免沾染衣袖，留意衛生者曷試用之。”<sup>⑬</sup>雷祥麟認為，衛生餐台是現代衛生概念與傳統社會生活之間達成的“創造性”妥協的具體展現，是有中國特色且符合衛生的在地創新。<sup>⑭</sup>

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處是研究性的學術機構，主要職責是從事傳染病研究和生產各類疫苗。但由於“疫之為害幾無間斷，人民畏之如虎，政府疲於奔命，其為慘酷蓋不忍言，長此以往無術消弭，則本處同人之責也。”因此，中央防疫處創辦了《通俗衛生月刊》，“冀以通俗衛生之常識灌輸一般之人民，使了然於群眾攝生之道，而促其力行，以減少發疫。”<sup>⑮</sup>此外，上海市衛生局主辦的《衛生月刊》，杭州廣濟醫院主編的《廣濟醫報》以及上海醫藥學雜誌社出版的《醫藥學》等專業期刊，也包含有公共衛生宣傳內容。一些地方的衛生機關還將每月刊印的期刊贈給各學校圖書館、書報室以及其他公共機關，並以低價出售，以便民眾購閱。這類刊物取材注重一般的衛生常識，內容編排頗豐富，如北京市衛生局編印的《衛生月刊》有專載、論著、檢查統計、衛生行政、衛生要聞、衛生教育、插圖、文藝等項。<sup>⑯</sup>北京市第一衛生區事務所主辦的《大眾衛生》強調：“所謂大眾衛生是沒有階級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衛生的真義。社會上各色人等，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貴賤，只要他們活著，他們就應該具備這種衛生常識，躬行實踐，以謀自己和人類的幸福……”<sup>⑰</sup>《通俗醫事月刊》是由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組成的艾西學會創辦的普及性醫學雜誌，該刊旨在為促進國民衛生知識的發達擔負責任。創辦者尤為強調醫學專業人士不能只限於自己的專業領域，更需要指導大眾，以謀人類健康之完滿。<sup>⑱</sup>現代醫療衛生知識的引介也是大眾報刊上的重要欄目，《申報》、上海《時報》、北京《晨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等主要報紙都辦有“醫學週刊”副刊或設置“衛生常識”專欄等。

無論是醫學團體或衛生專業機構出版的醫藥衛生普及性期刊，還是大眾報刊上所刊發的普及

性文章，大多由醫學專家撰寫，一方面是向公眾講解疾病防治的新觀念、預防治療的新方法、維護健康的基本知識，提高國民衛生知識水平；另一方面則試圖以衛生和健康的話語，來規訓國民的日常生活行為。從何謂“打針”，如何“防疫”，怎樣“吃藥”，到“飲食要選擇”“哺乳的次數”“理髮館的衛生”“飲料水應該怎樣注意”等，一一明確哪些行為是正確的，應該提倡，哪些屬於陋習，應該制止。無論是醫學專業人士還是知識菁英都認為民眾衛生知識貧乏，許多陳規陋習危害著大眾的健康，因此，需要急切改變這種“愚昧落後”的狀況，需要灌輸國民衛生常識。因為“我國向來受愚民政策的毒，國民的知識，異常淺薄。一些衛生常識，在文明各國差不多婦孺都有，說到我國卻就不然。”因此有必要灌輸衛生知識於國民，這種灌輸除辦衛生報之外，開展通俗衛生演講亦為重要。“欲改造習慣，促進文明，演講便是一種利器，這是世人所公認的。況在我國教育尚未普及，民智這等閉塞，什麼是衛生，國民多半不能瞭解。既不能瞭解，便不去注意。欲設法使他們瞭解和喚起他們的注意，徒然多辦幾種醫學報還是不中用的，因為大多數不識字的人，得不到一點好處。要想好處普及，不是從演講上著手不可。”一方面應大大增加通俗衛生的演講，此外應在平民學校裡開展衛生知識的演講，方能使大眾受益。<sup>④</sup>

開展健康教育、倡導衛生習慣，不僅是為了有效的防控傳染病，也是國家與社會菁英通過知識—權利機制，試圖將每個個體都納入到社會控制的範圍裡。胡適在為陳方之《衛生學與衛生行政》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清楚地闡明了這個觀點：“公共衛生的原理有兩點：第一，人類的健康和疾病都和環境裡的種種因子有因果的關係，而這種種因子大都是可以用人類的智力來管理制裁的。第二，這種種和健康疾病有關的因子，如水、如空氣、如病菌，大都是屬於很廣漠的範圍，關係一區域一城市，不是個人的能力所能及，只有公家機關才能管理制裁。所以公共衛生的意義只是充分運用行政機關的權力，管理制裁一切關係人生健康、疾病、生死的種種重要因子，掃除疾病的來源，造成清潔健康的環境。”<sup>⑤</sup>

醫學社團在衛生知識的宣傳與教育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1913年，在北京舉行的博醫會全國代表會議上，公共衛生問題成為與會醫生所關注的問題，奧斯古德醫師發表了“中國衛生宣傳計劃”的演講，強調衛生知識的宣傳在中國是十分必要的工作，通過現代醫學知識的普及來逐步轉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博爾特醫師的“學校的醫療監督”和休梅克醫師的“體格鍛煉的必要性”討論了如何推進衛生知識普及的具體措施。<sup>⑥</sup>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Joint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於1916年由博醫會、中華醫學會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共同創辦。1922年該會改名為中華衛生教育會。1925年出版中英文季刊《衛生》，1926年出版《中國的衛生宣傳》（*Broadcasting Health in China*）。<sup>⑦</sup>該會通過舉辦衛生展覽、報紙宣傳、衛生演講等活動來傳播公共衛生知識、倡導培養衛生習慣、開展清潔衛生運動。如1917年，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舉辦了“全國衛生論文競賽”，以促進學生對公共衛生的興趣，競賽的題目為“中國目前衛生情況如何更進一步發展”。組織委員會共收到51篇論文，最後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楊得寶和林步基分獲一、二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吳葆光獲第三名。獲獎文章刊登在當年出版的《中華醫學雜誌》上。<sup>⑧</sup>1919年，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又舉辦了第二屆“全國衛生論文競賽”。這次競賽分為大、中、小學三組，共有11個省的61篇論文進入決賽，其中江蘇25篇，直隸13篇，江西5篇，湖南、浙江各3篇，山西、湖北各2篇，福建、山東、甘肅、廣東各1篇。21篇為英文論文，40篇為中文論文。論文題目有：什麼使人生病？個人衛生；家庭衛生；衛生作為導致國家興亡的一種因素；國家衛生和國家福利之關係等。大學組第一名由東吳大學法學院吳約翰獲得，其文章題

目為“國家衛生與國家福利之關係”。中學組第一名由湖南長沙的歐陽青（音）獲得，其文章題目為“論個人衛生”。小學組第一名由江西南昌葆靈女中的沈晨珊（音）獲得，其文章題目為“什麼使人生病”。<sup>⑧</sup>這些活動在推動全國衛生宣傳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除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外，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各種宣傳衛生知識、促進健康的組織。1913年秋，長沙組織了一個“婦女社會服務聯盟”，獲得了市衛生科和雅禮醫院的支持。該聯盟定期舉行衛生教育講座、發放衛生知識宣傳品，同時還開展大規模的兒童種痘，受到了當地人的稱讚。<sup>⑨</sup>1916年成立的江蘇公共衛生協會頗具規模，協會由著名實業家張謇擔任首任會長，副會長則由地方紳士、警察局長、師範學校校長、衛生科長等擔任。協會下設醫學教育、研究、環境衛生檢查、流行病預防和家庭衛生5個科。1918年，上海的12個宗教和慈善團體成立一個“道德福利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呼籲廢除各種國籍的妓院，開展妓女的性病治療，向妓女進行衛生宣傳和防病講座。漢口、杭州、南京、廣州等城市也先後成立了旨在推行衛生教育的協會和學會，雖然這些地方組織維持的時間都不長，但他們的努力使國人認識到不講衛生的習慣是導致疾病的重要原因，倡導以養成講衛生為榮、不講衛生為恥的社會風尚。

## 二、醫學成為文化批評的公共話題

### （一）中西與新舊

在新文化運動有關科學問題的討論中，關於中西醫學的論爭最為激烈，幾乎所有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都加入到這一論爭中，其基本觀點是：西醫能說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學；中醫不能說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學。這種觀點至今仍然為一些人所認同。中西醫問題的爭論不僅涉及到兩種醫學體系理論與實踐的價值，而且更廣泛地牽涉到東西方文化傳統問題，涉及不同的自然觀、生命觀與方法論問題。因此，中西醫學的論爭自一開始便從醫學界擴散到整個文化界、思想界、知識界，甚至政治界。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就對西醫以科學原理為基礎的診斷治療技術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將創辦西醫教育作為洋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李鴻章在1889年給香港西醫書院掌院的回信中提到，“愚意，此醫學當與其姊妹科學之化學，同予注重，非第須了解其如何組合，且須明瞭其如何分析；蓋不如此，不足使其於診斷病症及準備醫療上，臻於更大之精確性也。……蓋此種由於永注於科學原理以行診斷之美滿收穫，即足以保證其補救在解剖學及化學純理研究之不足，而其結果，將使智識由黑暗而為炳耀，天津醫學館即一光輝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學之利益，霑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也。”<sup>⑩</sup>在晚清官吏和士大夫階層中，提倡西醫批評中醫者大有人在。吳汝綸認為：“今西醫盛行，理精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瘵痼疾，決無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可悼嘆。”<sup>⑪</sup>他還指出：“平日灼知中醫之不足恃，自靈樞、素問而已然，至銅人圖，則尤不足據，本草論藥，又皆不知而強言。不如西醫考核臟腑血脈的有據；推論並形，絕無影響之談。其藥品，又多化學家所定，百用百效。”<sup>⑫</sup>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醫道》中說：“西國醫理、醫法雖與中國不同，得失亦或互見。然事實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勝於中國之漫無稽考。……西醫論人身臟腑、筋絡、骨節腠理，如鐘錶輪機，非開拆細驗，無以知其功用及致壞之由。……今中國習醫絕無此事，雖數世老醫，不知臟腑何形。遇奇險不治之症，終亦不明病源何在。……（西醫）其內症更持機器於腕中，以辨聲音之虛實；置寒暑表於口內，以察臟腑之寒溫。一切藥性病源無不

本化學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識見自真。”<sup>⑩</sup>由此可見，晚清部分官吏和士大夫在西醫疾病觀與治療觀的影響下，已開始對中醫表示出不信任的態度。

新文化運動中這種中醫與西醫的對比，轉化為新醫學與舊醫學的對比。新舊之區別則賦予了明顯的價值判斷。不過，最初“新醫學”只是指來自西方的新的醫學知識與技術，並沒有“舊醫學”的提法。例如，1910年，丁福保舉辦的新醫學函授講習社，招收研究“新醫學”的社員九十多人，大多為開業的中醫，函授課程包括解剖、生理、衛生學、傳染病檢驗、西藥實驗及家庭侍疾法等，旨在推動中西醫的匯通。<sup>⑪</sup>1912年之後，受到教育部頒佈的“大學規程令”將中醫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的影響，“新醫學”獲得了政府的認可，而中醫則被認為是“舊醫學”，應逐漸淘汰。1916年伍連德讀了“高等文官考試”命令之後，發現考試的“所有問題均為歐美各邦醫學課程不可缺少之要點，舉凡中國舊日種種腐敗醫道，悉在摒棄之列。足徵政府已了然舊醫之不適用於今日，有意維新也。夫我國醫業不振，退落列強之下，歷年民生死於非命，時罹痛苦者，恒沙難數，深堪惋惜。溯自世界三十載以來，新醫蒸蒸日上，新學時有發明。獨惜我文物之邦，猶未沾此利益。”<sup>⑫</sup>由此，伍連德期望北洋政府大力推動“新醫學”的發展，以改變“各國常謂我為發生瘟疫之祖國”的狀況。蔡元培在為《醫學叢書》所寫序言中指出：“自歐化輸入，吾國始有所謂新醫學。新醫學者，以最新之科學為根據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據於解剖、組織等學，非吾銅人圖之粗疏而訛謬也；其言病理也，根據於種姓之遺傳，微生物之研究，各種儀器之測候，非若望聞切之粗略，陰陽五行之說之懺恍也。其用藥物也，率皆擷其菁英以應用，其對證之一點，非若舊方之雜投、生藥、互相克制，以病者之腸胃為戰場也。故新醫學興，而舊醫學不得不衰歇。”不過，蔡元培同時也認為若將“一切舊日之經驗皆得以吐棄之，則不可”，提出“集數千年經驗之成績，以供新學家之參考而研究，其有裨益於醫學前途，必非淺鮮，蓋可知矣。”<sup>⑬</sup>

西醫與中醫的稱謂是依醫學知識來源不同而劃定的，並不蘊含價值的判斷，而“新醫”與“舊醫”的稱謂本身便負載有價值判斷，“新醫”與“新學”相呼應，是科學的與進步的，而“舊醫”自然便成為不科學的、落後的。這種價值判斷不久便直接轉變為政治行動。從1917年余雲岫等反對中醫進入教育體系，到1929年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不僅導致“新醫”的倡導者與中醫的維護者之間激烈的論爭，並由此引發全國性中醫的抗爭浪潮。中西醫新問題由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 （二）科學與非科學

民國以後，西醫獲得了醫學的主導地位，政府採用西方的醫療衛生體制建構起新的國家衛生體系。“五四”前後的文化氛圍導致主流知識界極力提倡新醫學的發展，他們認為醫學沒有中西之分，只有新舊之別；只有玄學的醫學和科學的醫學之區別。從孫中山、汪精衛等政界人物及胡適、梁啟超、嚴復等學界領袖的言論中都體現，從而影響到民眾對中西醫學的重新認識。

辛亥革命後到新文化運動，隨著大批留學知識分子的歸國，倡導西學，鼓吹科學與民主，科學文化構成了近代文化的主旋律。胡適在1923年的人生觀大論戰時所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sup>⑭</sup>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西醫，成為當時學界批判傳統文化的有力武器。嚴復在所譯《穆勒名學》的評注中說：“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干支之所支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

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sup>⑧</sup>

對比西醫的科學實證方法，近代學者認為中醫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疾病認識與解釋體系是不科學的。梁啟超曾明確指出：“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的大本營……此種詭異之組織，遂二千年蟠據全國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國人之行事。嘻！吾輩死生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sup>⑨</sup>他還比較了中西醫生的教育，認為：“西人醫學，設為特科，選中學生之高材者學焉。中國醫生乃強半以學帖括不成者為之，其技之孰良，無待問矣！《漢志》方伎猶自列為一略，後世廢棄，良足嘆也！”<sup>⑩</sup>因此呼籲醫學必須改良，西法必須引進。

胡適在為《人與醫學》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醫學關係我們的生命，關係我們愛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說，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其實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醫學的常識。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該讀這樣的一部書。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的許多傳統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吃藥，甚至於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甚至於使我們反對科學的醫學。到了危急的時候，我們也許勉強去進一個新式醫院；然而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瞭解醫生，不瞭解看護，不瞭解醫院的規矩。”<sup>⑪</sup>由此可見，主流知識界寄希望於通過西醫改善國人的醫療保健，用西醫改造中醫。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科學”在中國逐漸被賦予了“合理”、“正確”的涵義，甚至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其實，科學也只是在一定時期內相對正確的知識，任何最先進的科學都存在著一定的或潛在的“錯誤”。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中醫藥的科學性問題，然而，爭論雙方卻是在沒有取得“什麼是科學、具備什麼條件的知識體系才能構成為科學”等共識的情況下進行口水大戰，難以得出有益的結論。從中醫的觀點來看，即使認識到了疾病的發生發展規律，也具有實踐性、可驗證性，但不能完全按現代科學的術語表述，以及由於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認識和解釋暫時無法被現代科技所實證，因此，很容易就會被認為是不符合科學標準，並被指責為“偽科學的”、“不科學的”，甚至是“反科學的”東西。

中醫藥的科學性問題及相關爭論，實際上已不是一個單純的中醫藥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觀念問題，更是一個哲學問題，僅僅局限在中醫藥範圍來討論是難以解決的。因此，我們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審視中醫藥，要從對科學概念的認識觀念上來一場革命，搞清楚中醫藥到底是一門什麼樣的知識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理解中醫藥科學問題的百年之爭。

### 三、衛生運動：從社會改良到國家治理

卡羅爾在論及科學、文化與現代國家的形成時指出：“從實踐的角度看，現代國家形成時期，是一個政府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持續快速發展的過程，形成了科學與國家網絡：科學與統治實踐之間非均勻連接的密集網絡。”<sup>⑫</sup>他還進一步論證了公共衛生、人口普查、出生與死亡登記等是國家與科學網絡三角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國家憑藉對公共衛生的監督與管理，來達到控制與消除病因、保障民眾健康的目的，同時也有助於國家對整個社會群體的有效監控。不過，政府也清楚地看到，僅僅監督是不夠的，還需依靠社會動員，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參與到衛生促進的活動中來。正如伍連德所指出：“人民之習慣依然最關緊要之吸水亦不知擇潔，隨地亂吐痰涎，居處閉塞，塵穢不除，礙人身體康強，傳染病因之綿延不絕。”<sup>⑬</sup>因此社會應積極辦理衛生公益活動，開展衛生宣傳與普及運動。



### （一）衛生運動的興起

衛生運動（sanitary movement）是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文藝復興之後，城市化、商業化導致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公共衛生問題的凸顯，如大量垃圾、汙物需要處置；不潔飲水、逼仄居舍導致傳染病蔓延。在細菌病原理論出現之前，風土（endemic）與瘴氣（miasma）致病的觀念導致城市管理者針對患病個體和周遭環境採取控制措施，諸如隔離病人、清掃垃圾以及提供潔淨的飲水等。十九世紀末，公共衛生和傳染病預防的思想在中國開始得到廣泛地宣傳。清末新政中已有關於城市衛生的制度安排。以病原微生物理論為基礎的傳染病預防和公共衛生的觀念，逐漸改變了傳統的風土與瘴氣致病的觀念，隔離、檢疫、消毒、滅菌、講究環境衛生等概念開始為人們所熟悉。衛生運動作為社會微觀治理的有效措施，將規訓、監管個人的身體與公共利益聯接起來，成為一種現代性的象徵。

衛生運動既有地方政府衛生行政部門主辦的，也有社會團體發起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大中城市。1915年成立的中華醫學會，其宗旨之一就是“促進我醫學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喚起民眾對於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興趣。”<sup>④</sup>1916年2月，中華醫學會第一次會議在上海召開，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知識的傳播是這次會議的五項議題之一。顏福慶在開幕式致辭中強調了中國醫生在推進醫學科學和公共衛生方面所面臨的艱巨任務。<sup>⑤</sup>伍連德發表了“如何導致健康的生活”的大會演講，出席會議的醫生還就“預防醫學”、“中國現代衛生學的基礎建立”、“自從1911年革命以來在漢口對衛生改革的若干嘗試”以及“家庭衛生”等問題發表了演講。會議期間，還組織了一系列衛生保健和疾病預防知識的公開展覽，每天有數百人參觀。根據顏福慶的建議，中華醫學會設立了衛生教育組，與博醫會和青年會合作在全國共同推進衛生宣傳和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的衛生意識，普及疾病預防知識，成為近代醫學家的一項重要工作。

衛生運動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的“衛生運動”，例如，1920年代，上海和北京的衛生行政部門都舉辦“衛生運動周”，主要活動包括：講座、展覽、衛生考試等，有時還舉辦衛生遊行。1923～1931年，滬西公社、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等社會團體先後舉辦了5次衛生運動，用圖片展覽、電影等方式宣傳預防疾病、育嬰、撲滅蚊蠅等衛生知識。1935年，中國防癆協會主辦勸止隨地吐痰運動大會，組織演講，放映《癆病自述》等衛生影片，並分學生日、工友日、商民日、團體日進行防癆宣傳和勸阻隨地吐痰。另一類是在某種傳染病可能爆發前舉行的預防活動。例如，1925年，安徽蕪湖在天花開始流行時，開展了大規模的牛痘接種運動，在一周內接種了5,000人次。1933年，廈門為了防止當地鼠疫的爆發，衛生促進會主辦了聲勢浩大的“捕鼠運動”。衛生運動的開展，讓社會公眾瞭解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公眾的衛生意識，也為其他公共衛生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鋪平了道路。

### （二）現代醫學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有關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汗牛充棟，但大多關注新文化運動對思想、制度的影響，而對新文化運動如何影響普通民眾的日常觀念、行為與生活，則研究不多。有學者認為，無論是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啟蒙運動，從根本上說除了實現人文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以外，並沒有真正觸動普通民眾自在自發的傳統生存模式。對於廣大民眾，特別是對依舊封閉在傳統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廣大民眾，並沒有引發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真正改變。<sup>⑥</sup>

的確，民眾日常生活及其生存模式的變化，並非如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論爭那樣具有標誌性。但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只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沒有真正觸動普通民眾的日常生

活，卻失之偏頗。儘管很難找到衡量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與人權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計量指標，但我們依然可以發現新文化運動中不僅人文知識分子，而且科學界、醫學界通過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努力改變著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並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健康、疾病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聯繫最為緊密。新文化運動倡導新的衛生觀念，通過報紙、雜誌、衛生宣傳畫、幻燈以及各種衛生運動，持續地、潛移默化地塑形了民眾的健康觀、疾病觀、衛生觀、清潔觀，並改變著日常行為方法，如飯前便後洗手、不隨地吐痰。1932年，《家庭週刊》刊載了一個衛生規則檢測表，共列出32條衛生規則，每條都標有分值，讀者可自我測試，若分值達到75分算及格，85分為體格健康，90分為優秀。<sup>④</sup>在醫學界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衛生知識的普及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些大中城市，人們的衛生觀念逐漸開始轉變，“衛生”一詞成為街市上招攬生意的一塊頗為吸引人的招牌。“於售賣清涼飲料者，每署曰衛生冰激凌、衛生酸梅湯；於售賣滋養食料者，每署曰衛生豆精、衛生牛乳。此外浴室、理髮館以及其他商店之以衛生二字命名者，亦所在多有。”<sup>⑤</sup>衛生成為近代社會轉變的標誌之一。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節點，其核心是啟蒙。有關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政治啟蒙，而對科學啟蒙的社會文化價值則評述不多，但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文化，同樣也深刻地改變著人們對社會、文化、政治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模式，尤其是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的觀念與實踐不僅是科學文化重要內容，也是向大眾普及科學文化，聯接國家、社會與個體的最佳結合點，展示了科學文化的實用價值與世俗特徵。

①③陳獨秀：《敬告青年》，上海：《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15年9月）。

②④伍連德：《醫學與雜誌之關係》，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5年第1卷第1期。

④③伍連德：《中國新醫學發達之希望》，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6年第2卷第2期。

⑤伍連德：《醫學現在之取締及將來之挽救商榷書》，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5年第1卷第1期。

⑥ Gunter Regneri, Neumann, Salomon, in Arne Hessenbruch ed., *Reader's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0, p. 510.

⑦劉楨麟：《富強始於衛生論》，澳門：《知新報》，第39冊，1897年11月11日。

⑧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上海：《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1916年10月）。

⑨史介生：《強國必先強民》，浙江紹興：《紹興醫學報星期增刊》，1920年第10期。

⑩金子直：《民族衛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1頁。

⑪履冰：《論東亞病夫國之病》，浙江紹興：《紹興醫藥月報》，1925年第2卷第10期。

⑫陳獨秀：《新青年》，上海：《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1916年9月）。

⑬宋大仁、沈警凡：《全國醫藥期刊調查記》（上），上海：《中西醫藥》，1935年第1卷第1期；宋大仁、沈警凡：《全國醫藥期刊調查記》（下），上海：《中西醫藥》，1935年第1卷第3期。

⑭伍連德：《衛生餐法》，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5年第1卷第1期。

⑮雷祥麟：《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見祝平一編：《健康社會與華人衛生新史》，台北：經聯出版公司，2013年，第137頁。

⑯汪希：《通俗衛生月刊發刊詞》，廣州：《通俗衛生月刊》，第一號，1922年。

⑰王康久主編：《北京衛生大事記》（第一卷），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96頁。

⑱高維：《衛生教育淺說》，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34年第20卷第3期。

⑳佚名：《通俗醫事月刊出版的宣言》，北京：《通

俗醫事月刊》，1919年第一號。

②①毛子震：《醫界的將來》，北京：《通俗醫事月刊》，1920年第五號。

②②胡適：《公共衛生與東西文明》，見陳方之：《衛生學與衛生行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②③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3, 26 (1), pp. 51-106.

②④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第528頁。

②⑤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7年第3卷第1期。

②⑥ JCPHE, Results of Health Essay Contest,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1919, 5 (1).

②⑦ E. Hum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14, 29 (3).

②⑧李鴻章：《致香港西醫書院掌院書》，轉引自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第14～15頁。

②⑨⑩吳汝綸撰：《吳汝綸全集》（三），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第55頁；第141頁。

③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0～523頁。

③②丁福保：《與函授新醫學講習社社員書》，上海：《中西醫學報》，1910年第5期。

③④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4～66頁。

③⑤《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第2～3頁。

③⑥約翰·穆勒：《穆勒名學》，嚴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99頁。

③⑦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三十三《陰陽五行說之來歷》（192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③⑧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頁。

③⑨西格里斯：《人與醫學》，顧謙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

④⑩派翠克·卡羅爾：《科學、文化與現代國家的形成》，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1頁。

④⑪伍連德：《論中國當籌防病之方實行衛生之法》，上海：《中華醫學雜誌》，1915年第1卷第1期。

④⑫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會章程草案》，上海：《中華醫學雜誌》，第1卷第1期。

④⑬顏福慶：《在中華醫學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上海：《中華醫學雜誌》，第2卷第1期。

④⑭衣俊卿：《日常生活批判與深層文化啟蒙》，哈爾濱：《求是學刊》，1996年第5期；楊威：《啟蒙與批判：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重建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④⑮鐵堅：《請注意衛生規則的測驗》，天津：《家庭週刊》，1932年第8期。

④⑯侯毓汶：《發刊詞》，北平：《衛生月報》，1939年第1期。

作者簡介：張大慶，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191

[責任編輯 陳志雄]